《世界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 周谷城　田汝康

编委： 庄锡昌（常务）金重远　庞卓恒　迟　轲
祝　明　朱威烈　顾晓鸣　顾云深　马小鹤
孙志民　张宪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今天我们立足于祖国的现代化，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不难看出：现在世界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正日益趋于紧密，各国家或各地区之间的往来日益方便，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日趋紧密，几乎成了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但要使这些关系发展得很好，甚至合乎我们的理想，则研究、考察、寻找正确方向或理想前途的工夫，为不可少。着眼于文化方面的关系，组织学者、专家研究世界文化，出版世界文化丛书，已成了我们当前的迫切要求。

研究世界文化，先定出题目，请学者进行研究，写成专书，是可能的。学者自己先有研究计划，甚至已有研究成果，拿出来寻找适当的题目，更是可能的。我们组稿工作的进行，大体不外这些方式。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不加限制，是可以的，如“世界文化史”即属此类；估计这类著作不会很多。与此相反，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加以限制，也是可以的，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研究”即属此类；估计这样有限制的著作，一定相当多。介于这两极端之间，有的著作只在地区、时间上有所限制，如“中国先秦文化”或“美国现代文化”即是实例。有的甚至只在地区上有限制，如“印度文化”或“拜占庭文化”即是实例。此外研究文化的方法或理论，如“文化与时间”或“多维视眼中的文化理论”等都是实例。范围这样无定，体例这样不齐，只是由于

世界文化从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异，不易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不过，不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反而使学者、专家易于着笔或易于发挥各人的独创性。

至于文化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则不能忽视。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是不易明确的，这就要诉诸比较研究。即使诉诸比较研究，如果只拿现在与过去比，或拿中国与外国比，充其量只能了解文化的大势；必须进一步有具体细致的比较，才能把方向找出来。分别举例，如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相比，则知手工生产为落后，机器生产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落后、追求进步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宗教迷信与科学真理相比，则知宗教迷信为落后，科学真理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迷信、追求真理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压迫和剥削，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情；拿压迫剥削与平等互利相比，则知前者为可恨，后者是可贵的，于是反对压迫剥削、追求平等互利成了我们的方向。方向不能忽视，比较研究则大有助于方向的阐明。研究世界文化的学者、专家未必完全没有涉及过比较：把研究的对象完全孤立起来。不顾上下古今，不顾前后左右，是不可能的。今天谈比较，不过希望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再扩大，使比较的对象力求具体更具体。果能如是，则研究文化的方向或追求理想的前途决不会落空。余不多谈，即以此为序。

1986年10月6日写于北京

译 者 序

米歇尔·福柯（1926—1984），20世纪法国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青年时期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52年毕业于巴黎大学精神病理学专业，后从事精神病的理论研究及治疗。曾在国外讲学多年。1968年至1970年，任巴黎大学及樊尚大学教授。1970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直至逝世。

其著作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受结构主义影响，主要作品有：《古代的癫狂史》（1961），《临床学的产生》（1963），《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1969）；后期受后结构主义影响，主要作品有：《监督与惩处》（1975）《性史》第1、2、3卷以及遗著《性史》第4卷。

福柯的著作几乎都属于历史学研究的领域。但在这些历史研究的背后更深藏"认识论"的动机，即对人文科学（如政治经济学、语言学、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等）产生的历史可能性条件，对权力、伦理的发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在社会和话语等层次上进行探讨。福柯对历史的看法，对谱系学方法论的重视，都深受尼采的影响，尼采曾计划总结有关真理、道德、社会和进步等各个方面都带有普遍性的基本概念。福柯认为应该提出一种各门学科都能以其为依据的基本概念，即人的概念。他认为从事人文科学的专家必须研究自己工作的这门科学的由来，以便去伪存真，把科学和形而上学区分开来。他本人的研究几乎全然地抛弃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传统而独树一帜。传统的历史观是以连续性、因果性和目的论为原则的，而福柯则强

烈反对并彻底抛弃这些原则。他的知识考古学是一种反历史的历史，它强调历史和认识论中的间断性、断裂、限度和转换的特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的诞生。与尼采颠覆基督教文化传统相似，福柯是西方史学传统的破坏者，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叛者。

《癫狂与文明》是福柯的成名作。1961年初版名为《癫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的癫狂史》。1972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第二版，名为《古典时代的癫狂史》，成为该书的定本。此中文译本系根据美国兰登书屋1973年4月的版本转译，英译者为理查德·霍华德。该译本经作者本人略作删节，并增添了初版中的某些内容，包括“激情与谵妄”一章。

在福柯丰富的著述中，《癫狂与文明》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给人们提示了福柯哲学的来龙去脉及其思想实质所在，同时也体现了其结构主义哲学写作语言的鲜明风格。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本书时，能较容易地理清作者思想的脉络、掌握本书的要旨，我们先将本书的内容作个概要的介绍。

中世纪末，麻风病突然在西欧销踪匿迹。人们把麻风病人从村社中、从社会生活中驱逐出去，把他们关进麻风病院。不久，这些麻风病院由于经济等原因，受到整顿、缩减或被改作普通医院用，麻风病人遂被关进医院，与外部世界隔绝。空出来的麻风病院到了17世纪就成为关押和囚禁“癫狂病人”的场所。其时，西方人认为癫狂是一种“罪恶”，因此对病患者采取隔离、驱逐和净化的残酷措施。

从15世纪末期到17世纪初期，欧洲人对癫狂病的态度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对病患者恐惧万分，把他们装上“愚人船”驱逐到远方；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甚感兴趣、极为关注，这充分表现在民间传说、滑稽戏中以及各种戏剧人物身上，如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所提到的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和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奥菲莉亚等。在戏剧表现中，癫狂者往往以疯态来捉弄人们，而后用病态的语言道出真理，这反映出人们的担忧和困惑：癫狂似乎是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他们试图通过癫狂表现去探求人性以及世界的真实性。

到了17世纪中叶，在西方人对待癫狂者的态度上，批判的一面占了上风。以笛卡尔等哲学家为代表，西方人开始崇拜理性，确立理性崇高威严的地位，以此把癫狂病压制得“缄默无言”，具体表现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对癫狂者的排斥过渡到对他们实行“大禁闭”。

1656年，在巴黎建立了“总医院”，拉开了对癫狂病人实行大禁闭的序幕。总医院将疯癫病人、理智失常者、贫民等不分青红皂白地关押在一起，因为从“理性”的角度视之，这些人都是“非理性”的。这种形式迅速遍及其他地区，英国和德国也纷纷起而效仿。从此，欧洲的癫狂病患者开始了长达150年左右的禁闭生活，直到1794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比奈尔和图格等人进行监狱改革并宣布释放在押病人为止。

把病人关进医院并非出于医疗目的，而是为了惩治他们。在整个古典时期，西方并没有理解癫狂的本质。他们把病患者看作是“作恶的畜生”，并把癫狂与卖淫、犯罪、乞讨等社会邪恶形式混为一谈，用“大禁闭”的残忍方式排除“非理性”，从而确立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理性与秩序的地位。

从1770年开始，人们渐渐意识到，把病人禁闭起来并非良策，若能把他们改造成劳动者将有助于创造财富，摆脱大众贫困，为政府节约一笔行政开支。另一方面，处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人们已开始从普遍的“人权”观点来看待癫狂病，再加上一系列人道主义思想的出现，人们逐渐抛弃视癫狂为罪恶的观

点，而把它看作是精神病了。

1794年，比奈尔宣布“总医院”的改革方案，释放了禁闭的病人。紧接着，图格在英国实施了同样的改革。释放出来的病人终于获得人身自由，有的被送往医院治疗，有的则送到家庭救济所。但是，由于贫困，而且大多丧失劳动能力，所以他们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精神上仍受到严厉的禁锢。

从18世纪末期开始，随着对待癫狂病的观念上的变化，医学思想与监禁措施也逐步从完全分离走向相互结合。但在病人与医生这一对关系中，前者仍然是被动消极、沉默无言、受后者任意摆布的，直到19世纪下半叶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学之后，癫狂才被当作一种精神病得到正当的治疗。

通过福柯对古典时期癫狂史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是通过残酷地禁锢、压制和排斥癫狂与非理性来确立自己的理性观念和秩序系统的。依福柯看来，癫狂应有它自身的价值与合法地位，对癫狂者的压制就是剥夺人的自由的表现。因此，当福柯抨击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对癫狂者的禁锢和压制时，其实质就是在维护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

本书材料丰富，涉及学科多种，作者还处处引经据典，有些引证仍保留原来的文字，如拉丁、希腊、德语等，显示了作者宽广的知识领域和扎实的理论功底。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作了应有的努力，也增长了不少知识。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我们曾多方请教，均获热诚的帮助与指点。此外，我们还得到过同事、我校外教以及法语专业部分教师的无私帮助，仅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因水平所限，不妥之处，谨请读者教正。

译者于南京

1990年1月

目　录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译者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愚人船”　1
第二章　大禁闭　34
第三章　精神病患者　58
第四章　激情与谵妄　76
第五章　癫狂面面观　107
第六章　医生与病人　145
第七章　巨大的恐惧　181
第八章　新的分裂　200
第九章　疯人院的诞生　21
结论　251

前　言

帕斯卡说过："人必然会发疯，若不疯便等于是癫狂的另一种形式。"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作家日记》中写道："人们并不是通过禁闭自己的邻居才相信自己没有疯。"

我们必须写癫狂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出于这种癫狂，人们以纯粹的理性为理由禁闭他们的邻居，用冷酷无情的非癫狂语言互相交谈，互相认识。我们还必须在这种共谋关系在真实性范畴里牢固地建立之前，在它被抗议的激情所振奋之前，确定共谋的时间。我们必须设法在历史上回到癫狂发展过程的起点，那时，癫狂是一种尚未显示出差别的体验，一种分裂本身尚未被分裂的体验。我们必须从它的运动轨迹的起点来描写"另一种形式"。这一种形式把理性抛向其运动的一边，把癫狂抛向另一边，使它们此后互不相关，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就好象彼此相对的一方已经死亡。

显然，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领域。为了探索这个领域，我们必须放弃最终总会有结论的想法，也决不让自己被可能已知道的有关癫狂的情况牵着走。在精神病理学的概念中，特别是在含蓄的回顾过程中，没有一个概念能起归纳作用。最基本的要素是区分癫狂的活动，而不是一旦分裂已经完成，平静已经恢复，再作阐述的科学。具有独创性的是构成理性与非理性间

距的分界线。理性征服了非理性，并从非理性中逐出表现为癫狂、犯罪或疾病的真实性。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很清楚是源自于这一分界线。因此，我们不要装着要获胜，装着有权获胜的样子，我们必须讨论这一开始就存在的分歧，讨论这些在历史上已考察过的活动，把一切可能被当作结论，或利用真实性作借口的东西束之高阁。我们还必须讨论这种分裂的活动，讨论已形成的间距以及在理性与非理性中间所形成的空虚，决不人云亦云，依赖一切现成的说法。

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决定癫狂者和理性者虽在逐渐分离，但仍有联系的领域，他们使用在科学语言出现之前的一种原始的、极其粗糙的语言谈论他们的分裂，并以躲躲闪闪的方式证明他们相互仍在对话。因此癫狂、非癫狂、理性、非理性都十分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当他们是一个整体时，他们互不分离，并在使他们产生分裂的交流活动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联系。

在精神病的平静世界里，现代人不再和癫狂病人交谈了。一方面，有理性的人委托医生去照料病人，由此认可了只有通过抽象的疾病的普遍性才能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另一方面，癫狂病人只有通过一种同样是抽象理性的中间媒介，即社会秩序、对身体和道德的约束、社会人群的无形压力以及符合一致的要求，才能与社会交流。至于共同语言，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说再也没有这种东西了。18世纪末，癫狂作为一种精神病，为破裂的对话提供了证据，确定了已成现实的分裂，并把癫狂与理性进行交流所使用的一切没有固定句法、结结巴巴又支离破碎的词语抛入九霄云外。精神病学的语言，也是一种有关癫狂的理性独白，就是仅以这种沉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我并未试图撰写这种语言的历史，而是想对这种沉默寻本

求源。

希腊人与一种他们称之为傲慢的东西有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谴责关系；斯拉西马奇或卡利库的存在足以证明这一点，尽管他们的语言传到我们时已被包围在苏格拉底的使人放心的辩证法中了。但是希腊的理念没有反对命题。

自中世纪以来，欧洲人一直与某种他们不加区别地称之为癫狂、痴呆和精神病的概念有关。也许西方理性的深度在某种意义上应归功于这种模糊性的存在，就象苏格拉底理性者的智慧归功于傲慢的威胁一样。总之，理性和癫狂的关系形成了西方文化独创性的一面；这种关系早在赫利奥尼马斯·博什④之前，就已伴随着西方文化，在尼采，阿尔托②之后还将长时期与西方文化联系在一起。

那么在理性语言掩盖下的这种冲突是什么呢？不沿着其水平方向遵循理性前进的提问能把我们引向何处呢？这种提问寻求在时间上追溯以非欧洲文化对抗欧洲文化的恒定垂直性，并通过自身的错乱来建立自己的领域。我们所进入的又是什么领域呢？它既不是历史知识，也不是历史本身；它既不受真实性的目的论所控制，也不受理性的因果关系所制约，因为原因只有超出分裂才有价值和意义。无疑，在这个领域中，成问题的是界限，而不是对某种文化的鉴定。

古典时期——从威利斯到比奈尔③，从拉辛的《奥雷斯

---

①赫利奥尼马斯·博什（约1450—1561），尼德兰中世纪晚期重要画家，作品主要为复杂而独具风格的圣像画。——译注

②阿尔托（1896—1948），法国剧作家、诗人、演员和超现实主义理论家。——译注

③比奈尔（1745—1826），法国医生，以人道态度对待精神病患者的先驱。曾任巴黎比赛特男性精神病患者收容所的主任医生，进行解开患者锁链的大胆改革，并提倡心理疗法。——译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特》到萨德[1]的《朱利埃特》以及戈雅[2]的《聋人之家》——正好包括了癫狂与理性之间的交流，以激进方式修正其语言的时代。在癫狂史上，有两件大事以特有的清晰度标志着这种变化：一件是1657年总医院的建立和对穷人实行的“大禁闭”；另一件是1794年在比赛特释放了戴手铐脚镣的犯人。在这两大件异乎寻常的相对称的事件之间，发生了一件事，它的模糊性使研究医学的史学家困惑不解：按有些人的说法，这是在一个专制主义的政府中所进行的盲目压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通过科学和善行逐渐发现的癫狂的积极真实性。事实上，在这些意义可逆的情况下，正在形成一种结构，它没有消除模糊，但确定了这种模糊性。正是这种结构解释了从中世纪和人文主义对癫狂的体验到我们自己的体验的过渡。这种结构把癫狂限制在精神病的范畴之内。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人类与癫狂的辩论是一种戏剧性的辩论。在辩论中，人类遇到了这个世界上的神秘力量。癫狂的体验被夏娃的堕落、上帝的旨意、反基督教的人、变态以及一切令人惊叹的知识的奥秘的意象罩上了阴云。在我们这个时代，癫狂的体验在沉静的学问中保持沉默。而这种学问对癫狂了解太多，因此忽视了它的存在。但从一种体验到另一种体验的转变却在无意象、无正面人物及一种宁静透彻的情况下完成了。这种宁静的透彻性作为一种沉默的惯例、没有评论的行动、直接的知识，揭示了一个庞大的静止的结构。它既不是戏剧，也不是知识结构。它是历史在悲剧的范畴内发生停顿的分界线，而这个悲剧的范畴既确立了这种结构，又指责了这种结构。

---

①萨德（1740—1814），法国色情文学家。——译注

②戈雅（1746—1828），西班牙著名画家。——译注

第一章 “愚人船”

中世纪末，麻风病在西方世界销踪匿迹。在村社边缘，在城门附近，荒地连绵，久无人烟。这些地带不再受疾病侵扰，历经数百年无人问津。从14到17世纪，它们以怪异的符咒诱惑一种新的疾病的化身，期待另一种令人恐惧的怪相，并恢复了净化和排斥的习俗。

从中世纪盛期到十字军东征末期，在整个欧洲的地面上，麻风病蔓延的城市成倍地增加，麻风病院纷纷建立。据马蒂安·帕里斯的统计，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麻风病院多达19,000所。总之，当路易八世于1226年前后制定法国的麻风病院法律时，经官方注册的麻风病院就有2,000多所。光在巴黎一地的主教管区就有43所：这些病院包括布尔-勒-兰、科尔贝、圣-瓦莱勒和不吉利的尚普-普里（腐烂之地），还有夏朗通。最大的两所，圣-热曼和圣-拉扎尔就紧靠巴黎①：在另一种病史上，我们还将听到它们的名字。这是因为从15世纪开始，所有这些病院已空无一人；随后的一个世纪，圣-热曼成为少年犯的教养院；到圣·樊尚时期前，圣-拉扎尔院只剩1个病人，“朗格卢瓦先生，民事法庭的律师”。欧洲最大的麻风病院之

①参看J·勒伯夫的《城市与巴黎全教区史》（巴黎，1754—1758）。——原注

一南希麻风病院，在玛丽·德·梅迪西摄政时期只收容了4个病人。据卡特的回忆录，在中世纪末，图卢瑟一地有29所医院，其中7所为麻风病院；但是到了17世纪初，我们发现人们提到的只有3所，即圣-西普里安、阿尔诺-贝尔纳和圣-米歇尔。庆贺麻风病的绝迹是件大快人心的事：1635年兰斯市居民举行隆重游行，感谢上帝把他们的城市从这种祸患中拯救出来。

皇室控制和整顿捐赠麻风病院的巨额财产已有百年。在1543年12月19日颁布的一项法令中，弗朗苏瓦一世统计了病患者的人数并清点了财产“以整治麻风病院现存的混乱不堪的局面”。亨利第四则在1606年发布一项法令，指示清查帐目，并“将此次清查中所得款项拨出供养贫穷的贵族和残疾的士兵”。1612年10月24日发布了同样的整顿命令，只是这一次规定多余的收入用以供养贫民。

事实上，法国麻风病院存在的问题在17世纪结束之前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这个问题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挑起了多次争端。到1677年，仅多凡一省不是还有44所麻风病院吗？1672年2月20日，路易十四将所有军事和医院决议的实施权分派给圣-拉扎尔和蒙特-卡尔默的牧师：他们受托管理王国的麻风病院。大约二十年之后，1672年的法令被废除，随后从1693年3月至1695年7月通过一系列动摇不定的措施才把麻风病院的动产分配给其他医院和福利机构。分散在当时还存在的1,200所麻风病院里为数不多的病人都集中在靠近奥尔良的圣-默斯米病院里。这些法令首先在巴黎实行。在巴黎，国会将有关的收益转拨给总医院所属各机构；各省行政当局随之效仿这一做法：图卢瑟将其麻风病院的财物转交给不治之症医院(1696)；在诺曼底，博利厄病院的财物转送到凯恩的迪安旅馆；沃莱的

第一章 “愚人船”

中世纪末，麻风病在西方世界销踪匿迹。在村社边缘，在城门附近，荒地连绵，久无人烟。这些地带不再受疾病侵扰，历经数百年无人问津。从14到17世纪，它们以怪异的符咒诱惑种新的疾病的化身，期待另一种令人恐惧的怪相，并恢复了净化和排斥的习俗。

从中世纪盛期到十字军东征末期，在整个欧洲的地面上，麻风病蔓延的城市成倍地增加，麻风病院纷纷建立。据马蒂安·帕里斯的统计，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麻风病院多达19,000所。总之，当路易八世于1226年前后制定法国的麻风病院法律时，经官方注册的麻风病院就有2,000多所。光在巴黎一地的主教管区就有43所：这些病院包括布尔-勒-兰、科尔贝、圣-瓦莱勒和不吉利的尚普-普里（腐烂之地），还有夏朗通。最大的两所，圣-热曼和圣-拉扎尔就紧靠巴黎①：在另一种病史上，我们还将听到它们的名字。这是因为从15世纪开始，所有这些病院已空无一人；随后的一个世纪，圣-热曼成为少年犯的教养院；到圣·樊尚时期前，圣-拉扎尔院只剩1个病人，“朗格卢瓦先生，民事法庭的律师”。欧洲最大的麻风病院之

①参看J·勒伯夫的《城市与巴黎全教区史》（巴黎，1754—1758）。——原注

财物则分派给圣-福瓦病院。只有靠近博尔多克斯的圣-默斯米和加纳特收容室作为纪念物保留下来。

12世纪，光是英国和苏格兰就为150万的居民开办了220所麻风病院。不过早在14世纪它们就开始撤空；待到1342年，爱德华三世命令调查里彭医院时，院中已无麻风病人，他就把病院的财物分配给了贫民。12世纪末，大主教皮伊瑟曾建了一所医院，可是到1434年，在这所医院内，只能找到两张床是留给麻风病人的。1348年，著名的麻风病院圣-阿尔邦只收留了3名病人。24年后，肯特的罗门那医院因无麻风病人而被废弃。在查塔姆，建于1078年的圣·巴托洛梅麻风病院一直是英国最重要的病院之一；但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就医的病人仅有两位，最终于1627年关闭。

在德国同样出现了麻风病逐日减少的现象，只是过程也许缓慢一些；然而，对麻风病院的改造却因基督教改革运动而加速了，一切福利的和医院的设施都由市政府接管。莱比锡、慕尼黑和汉堡均照此办理。到1542年，施莱斯维格·霍尔施泰所有麻风病院的财物都移交给医院。施蒂特的一位地方行政官员于1589年所写的报告中表明：在专为麻风病患者而设的病院里已有50年未曾收容过病人。在李普林根，麻风病院很快挤满了患不治之症和癫狂的病人。

麻风病这样奇异地销踪匿迹毫无疑问并非是晦涩难解的医疗实践历久而产生的效果，而是隔离措施的自然结局，也是十字军东征后中断了东方传染病源的必然结果。麻风病绝迹了，留下了人们弃之如敝屣的那些低贱地方；种种并非意在清除这种疾病而只是与其保持敬而远之的距离，并把它置于一种远非崇高地位的习俗也受到唾弃。不容置疑，比麻风病存在得更为长久，而且在麻风病院撤空后数年仍得以继续存在的是依附于

麻风病人身上的那些价值和意象，以及麻风病人受排斥的意义，即这种显眼而又面目可憎的人不首先限制在一个神圣的领域便无法将他们清除干净的社会重要性。

如果麻风病被清除出这个世界或被清除出实际的教会团体，其存在仍然是上帝的一种永恒体现。因为它既体现了上帝的愤怒，也显示了上帝的仁慈。维也纳教会的仪式书上说："我的朋友，你染上这种病使我主感到高兴，你还极其荣幸地蒙受我主的恩典，他有意让你为你在世间的作孽而受到惩罚。"就在牧师及其助手踌躇不前地将他拽出教堂的时刻，麻风病人仍确信他可以为上帝作证："不论你离教会或传播真理的社团多远，你仍然蒙受着上帝的恩惠。"勃鲁盖尔画中的麻风病人远远地，却从未停止过加入攀登卡尔瓦里山的行列，在那儿所有的人都伴随在耶稣身旁。作为神圣的罪恶的见证人，他们正是由于受到排斥并通过这种与世隔绝的处境完成自身的拯救：通过一种奇特的、与良好的德行和祈祷背道而驰的逆反行为，他们被一只没伸出来的手所拯救。把麻风病人关在门外的罪人却为他们打开了通向天堂的大门。"为了升天，你应忍受你的疾病；因为我主未曾因此而厌恨你，也未曾因此而抛弃你；反之，倘若你有耐心，你将得救，正如死在富裕人家门口的麻风病患者却直接上了天堂。"受到抛弃使其得救；受到排斥却使其获得另一种交流方式。

麻风病已经绝迹，麻风病人不复存在，或者说几乎从记忆中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组织结构。往往在同样的这些地方，隔离的模式会再次出现，二、三百年后仍不可思议地相似。穷困的流浪汉、罪犯、"精神错乱者"取代了原先麻风病人扮演的角色。我们还将看到，对于他们以及把他们排斥在外的人来说从中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新生。虽然有了全新的意义，文化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